

从京东方言儿化现象看语言的跨层次协合运动

艾溢芳*

目 录

1. 引言
2. 京东方言儿化的特殊用法
 - 2.1 京东方言儿化特殊用法的表现
 - 2.2 京东方言儿化特殊用法的来源
3. 京东地区方言儿化音系统与音系结构的关系
 - 3.1 该地区方言的单字韵以及儿化韵系统
 - 3.2 该地区儿化韵的音系学意义
 - 3.3 京东方言儿化韵与单韵母的聚合关系
4. 京东方言-r音的跨层面协合运动与其特殊儿化用法之间的关系
 - 4.1 儿化音中-r语素功能的淡化
 - 4.2 音系结构, -r语素功能的淡化, 以及异源成分向儿化音汇入之间的关系
5. 京东方言中特殊儿化现象发展方向预测
6. 结语

1. 引言

在北京东部一些方言中, 主要是天津、北京东部的一些郊县方言中, 以及北京东部的唐山、秦皇岛的部分地区中, 儿化的表现非常有特点, 这些地区的儿化有着很多北京话中所没有的特殊语法功能。李思敬先生在其著作《汉语“儿”[ə]音史研究》中, 论及了这一带方言的特殊儿化现象 (李思敬, 1994, pp.91-98), 李先生书中将有这一的现象地区称为“京东地区”, 我们不妨沿用这一说法, 将这一

* 澳门理工学院 语言及翻译高等学校, 兼职讲师

带称为京东地区，这一带地区的方言统称京东方言。本文主要就京东方言的儿化现象，结合陈保亚（1990）提出的语言结构的“协合”理论，来分析这一地区儿化现象所体现的语音层面与音义关系层面协合运动的互动关系，从京东地区“儿化”现象的特殊表现形式来探讨“儿化”引发语言跨层面协合运动。

2. 京东方言儿化的特殊用法

2.1 京东方言儿化特殊用法的表现

京东地区方言中的儿化存在着一些特殊的语法功能，主要表现在这些地区有着谓词儿化的现象和相当于方位词功能的儿化等。关于这些地区儿化的特殊用法，在李思敬（1994）、张文光（2000）、李巧兰（2007）等文章中都有过讨论，本地区各地的方言志中也多有记载。俞敏（1984）指出天津武清方言的儿化就存在这样的现象。李思敬先生在其专著《汉语“儿”[ə]音史研究》中指出这些特殊用法是京东方言的特色，他所说的京东方言即是天津郊县宁河、宝坻，唐山的丰润等地。李巧兰（2007）的博士论文《河北方言中的“-儿”形式研究》对河北省范围内儿化的表现形式和分布地域进行了细致考察，我们可以从中看出河北省中儿化有这些特殊用法的地区集中在河北唐山、丰润、丰南、遵化、玉田、滦县、滦南、乐亭、昌黎、秦皇岛等地。综合考察学者们的研究、笔者自己的调查以及通过查阅京东各地方言志和其他方言研究材料所搜集的资料，本文发现，京东地区有这种儿化特殊用法的地区在地域上连成了一片，在《汉语方言地图集》中这一区域的地图中大致相当于下图圈起来的范围。



图 1 有特殊儿化用法的京东地区范围

这些地区儿化的特殊用法主要表现为¹⁾：

1. 名词儿化后相当于“名词+里”

一部分名词儿化后，其语法功能相当于“名词+里”这样一个方位短语，其中儿化的作用相当于方位词“里”。如（括号中为对应的普通话表达方式，下同）：

- 屋儿有人（屋里有人）
- 兜儿装着本儿书（兜里装着本儿书）
- 扔海儿去（扔海里去）
- 吃儿肚子儿去咧（吃到肚子里去了）

2. 动词、形容词儿化表示时体意义或方位概念

(1) 动词儿化相当于在动词后加时体虚成分

在上述地区，一些特定结构中，动词可以儿化，儿化后影响的是与动词相关的“体”意义。如：

1) 文中所举例句来自笔者的调查，并参考了各地县志、方言志，以及李思敬（1994）、张文光（2001）、李巧兰（2007）的记录以加以完善。

A. “V儿”相当于在动词后加“了”，表实现或完成

a. V儿+宾语或动量词，此时动词多为处置类动词，也有予取类动词，如：

这可要儿我命了（这可要了我的命了。）
刚才他让别人打儿一顿。（刚才他被别人打了一顿。）
着啥急呀，吃儿饭儿再走吧。（着什么急啊，吃了饭再走吧。）

b. V儿+来/去，其中“来”、“去”都读轻声，是趋向补语。这可能是“V儿”分布最多的结构。动词多为处置、移动、予取类动词：

衣裳上的泥都洗儿去咧。（衣服上的泥都洗了去了，即“衣服上的泥都洗掉了”）
这是我刚听儿来的。（这是我刚听了来的。）
在这儿吃儿去再走吧。（在这儿吃了去再走吧。）
你还追儿来咧？（你还追了来了？）

这种格式中的“V儿”在普通话中其实没有相应“V了”的形式，即没有诸如“吃了去再走”这样的说法。在李巧兰（2007，p.139）中说唐山等地有同义结构，可以说成“V的（ti）+来/去咧”，如“牛我牵的来了”。但在笔者熟悉的唐山乐亭方言中，这种结构是没有其他替代形式的。

B. “V儿”相当于在动词后加“着”，表进行和方式

主要出现在“V儿+（宾语）+来/去”结构中，动词多为移动、处置类动词，且此处的“来/去”不是趋向补语，而是实义动词，此结构表示的是来或去的方式，如：

—你咋来的呀？—我跑儿来的。（你怎么来的呀？我跑着来的。）
这车货我是拉儿来的。（这车货我是拉着来的。）

C. 动词儿化相当于在动词后加上方位介词“到”、“在”等

此时动词儿化表动作的趋向，后加处所宾语，处所宾语后还可再加趋向补语。其中动词也多为移动、处置、放置类动词，如：

歪儿哪儿去咧（歪到哪儿去了）
送儿家儿去咧（送到家里去了）
吃儿肚子儿去（吃到肚子里去）
知道错儿哪儿咧。（知道错在哪里了。）

3. 形容词儿化，出现在“A儿去咧”结构中

“A儿去咧”表示程度高，意为“很怎么怎么样”“非常怎么怎么样”。进入词结构的形容词主要是性质形容词，而状态形容词不能进入这个结构。如：

苹果红儿去咧。
那个房子大儿去咧。
那个人好儿去咧。
屋儿凉快儿去咧。
那个地方干净儿去咧。²⁾

在“A去咧”结构中，“儿”不能独立成音节，“A儿”的读音是儿化形式，表现了一种“实现”的语法意义。此结构中儿化的语法功能相当语普通话的动态助词“了₁”（如普通话：大了去了，好了去了）。

2.2. 京东方言儿化特殊用法的来源

以上我们简单介绍了京东方言中儿化特殊用法的表现和分布，那么，这些特殊的儿化是怎样产生的呢？从共时层面上看，它们似乎是“儿”语法功能的扩展，

2) 本文的一位匿名审稿人指出，在东北地区的一些方言中也存在这种形容词后的儿化现象。笔者将在以后的研究中对东北方言中的相关现象及其与京东方言类似现象之间的关系做进一步考察。在此对这位审稿人致以谢意。

造成了这些方言采用“儿化”这种语音上的内部曲折来表达时体、方位等范畴的效果。但实际情况却并不完全如此，这些特殊儿化的来源是非常复杂的，这些地区的“X-儿”是“同形异源的叠置结构”（李巧兰，2007）。

首先来看一下相当与于“里”的儿化来源。赵元任先生在《汉语口语语法》中曾指出，现代汉语儿化音词尾“儿”的来源有三个，分别为“里”“日”“儿”。其中由“里”变来的证据是“这儿”“那儿”“哪儿”等指示代词和疑问代词儿化的例子，它们是从“这里”“那里”“哪里”变来的。李思敬先生在《汉语“儿”[ər]音史研究》一书中指出，赵元任先生所说的“里→儿”的范围其实还要大得多。他给出的证据正是京东方言中的这种“N+了”表示“……里”的情况，并结合历史文献对其进行了论证。

再来看动词、形容词儿化表时体（“了、着”等）、方位（“在、到”等）范畴的儿化现象来源。李思敬（1994）指出，在赵元任先生所说的现代汉语儿化词尾的三个来源“里”“日”“儿”之外，还有另一个来源，即“了”。其证据就是京东方言动词儿化表完成的情况。不过关于“了→儿”的音变，目前尚未发现早期材料。对于动词儿化相当于动词加上“着”、“到、在”以及形容词儿化的现象，李思敬先生并没有论及。

从前文的讨论可以看到，这些特殊用法中的“儿”与普通话的对应比较复杂，不只可以对应“了”，也可以对应“着、在、到、得”等，所以我们不能单凭这些结构中“儿”同北京话中某个成分在语法功能上的对应，就简单地认为是“某变儿”，或“儿来源与某”。同时，河北方言中，相当于这些时体、方位范畴的“着”“到”“了”等虚成分，各地之间的用法也各不相同，各成分之间的功能多有交叉，情况比较复杂。那么，为什么这些表示不同语法意义的虚成分都会以儿化的形式出现在同一方言里呢？李巧兰（2007）认为，这些虚成分多读轻声，它们汇入儿化音是其读音进一步弱化发展的结果。正是这种读轻声的情况，有可能最终导致了其语音的趋同化，不同的成分最终全都弱化成了ə，后又与前一音节合音，即，“无论是时体成分还是介词和助词，它们都有可能最终走向脱落，只在前面的动词音节上留下痕迹”（李巧兰，2007）。最后在由“儿”变来的儿化的类化作用下，汇入了儿化音。

通过上面的讨论可以看到，这些京东方言特殊儿化现象中，儿化的各种语法功能，并不是“儿”语法功能的扩展，而是各种其他成分经过弱化、合音，并入儿化音的现象，于是形成了以“儿化”为表现形式的这样一种“同形异源的叠置结构”。

3. 京东地区方言儿化音系统与音系结构的关系

语言的演变既受到语言外的因素，如社会、文化条件等的影响，同时又与语言自身的结构密切相关。上世纪中叶马丁内（Martinet）提出了的“整合（integration）”的理论模型，用以解释音变原因。他认为整合就是整齐和对称。不整齐不对称的音系容易变化，其目的是达到比较整齐和对称的状态。（Martinet, 1978）“整合”模型是从语言结构入手探究音变原因的杰出尝试。不过由于时代所限，“整合”模型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陈保亚（1990）的《语言演变的结构基础》一文，对马丁内的整合模型做出了重大修正，提出了结构“协合”的重要概念，使得语言结构与音变关系的探索更进一步。在陈保亚（2015）的《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研究》一书中，作者也对“协合”理论进行了重新介绍。

陈保亚（1990）指出，自然语言是多层次系统，根本层次可以概括为语音层、语素层（表达意义层）、音义关系层。各层次在结构上都有自组织性，都有从不协合到协合的一般趋势，但这种趋势往往是不同步的。一个层面的协合可能导致另一个层面的不。汉语的儿化现象就是如此。汉语普通话中儿化产生的-r，从纯语音层面看是音位，因为-r和非-r是最小对立；从语素层面看是语素，因为-r和体词性功能相对应，能表达意义。所以儿化是跨层次的现象，从中能够体现出各层次协合运动的相互干扰。文中指出，北京话中，儿化产生之后，在语音层面和音义关系层面造成了两种不现象，分别是：第一，在音义关系层，由于汉语的重要特点之一是语素的语音形式不小于音节，儿化的产生，破坏了这种结构，两个语素融于一个音节，音义关层出现了不协合现象；第二，在语音层面，只有or、

ar有与之聚合的鼻尾韵母an、əŋ、an、aŋ, 而or只有oŋ与之聚合, 其他儿化韵没有与之聚合的单位, 这就造成了语音层面的不协合现象。由于语音层面、音义关系层面的协合运动, -r的语素功能开始淡化, 表义的体词性功能开始受到冲击, 其标志就是体词性功能的凝固化和非体词性儿化的出现, 最终引起了语素层面体词性词尾(-子、-儿、-头)系统的不和谐。文章论证翔实, 从一个新的角度解释了汉语儿化现象的发展原理, 揭示出了语言演变和音系结构之间的关系, 很有创见和说服力。

前文已经论证了京东方言的特殊的儿化现象不是“儿”尾自身的演变, 而是其他语法成分汇入儿化音的结果。但是, 这一现象直接导致了这些方言中非体词性儿化的大量存在。虽然这些非体词性儿化现象需要在特定的语法结构中才出现, 但是它客观上的确造成这些方言中许多动词、形容词都可以儿化了。那么, 京东方言儿化面貌的形成, 与其音系结构有什么样的关联? 下面, 本文就从京东方言的语音系统出发尝试去寻求一下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们发现, 有上述儿化特殊用法的地区, 其韵母系统与北京话相差不大, 但是它们儿化韵的归并却与北京话不尽相同。这一带各地方言的音系结构比较相近, 现在本文以笔者本人比较熟悉的唐山乐亭方言为例, 对这一地区的单字韵和儿化韵系统做一介绍:

3.1 该地区方言的单字韵以及儿化韵系统

乐亭县位于河北省东北部, 唐山市东南部。其方言属于冀鲁官话保唐片滦昌小片。根据笔者的调查, 乐亭方言共有37个韵母, 与普通话非常接近, 但有细微差别, 如下:

ɿ 资词斯自	i 基题李笔	u 古朱福骨	y 鱼娶橘玉
ʅ 时枝十池			
a 茶腊发达	ia 芽家瞎佳	ua 瓜话滑刮	
ɤ 科蛇婆摸		ur 过说多桌	
	ie 茄叶街灭		ye 靴月决略
ai 改排败麦		uai 外槐块帅	
ei 杯肺没黑		uei 灰税规微	
au 刀宝烧烙	iau 交小条药		
əu 头欧手轴	iəu 酒牛幼六		
ər 儿耳二而			
an 甘站懒饭	ian 间连甜先	uan 弯端关软	yan 泉院玄卷
ən 针根人盆	in 心民音近	uən 遵文春魂	yn 均云群旬
aŋ 党昌房邦	iaŋ 亮祥江阳	uaŋ 窗光狂庄	
aŋ 灯升冷风	iŋ 蝇幸平青	uŋ 荣东宗虫/uəŋ 翁	yŋ 永穷熊胸

表 1 乐亭方言韵母系统

其中如下几点需要说明：

(1) 乐亭话没有o韵母，普通话o韵母在乐亭方言中读不圆唇的ɤ，因此乐亭方言中唇音声母的“波、婆、摸、佛”等字和非唇音声母的“科、鹅、河、蛇”等字的韵母是相同的。相应的，uo韵母在乐亭方言中读ur。普通话o韵母读不圆唇ɤ是唐山、秦皇岛地区方言的普遍特点，宁河等天津东部郊县也是如此。相应地，这一带地区“ou”“iou”韵母的实际音值相应地也成了“əu”和“iəu”。

(2) 乐亭方言中，卷舌韵母ər并未像北京话一样根据声调的不同形成[ər]和[er]两个变体，乐亭话“儿”和“耳、二”的韵母是相同的。京东其他地区的表现也与之类似。

上述乐亭方言的37个韵母，除了卷舌韵母ər不能儿化以外，其它36个都可以儿化，儿化后生成下面7组20个儿化韵：

ar (a aŋ) ar组	ar (ai an) ar组	ɤr (ɤ əŋ) ɤr组	ər (ɿ ʅ ən ei) ər组
iar (ia iaŋ)	iar (ian)	iɤr (ie iŋ)	iər (i in)
uar (ua uaŋ)	uar (uai uan)	uɤr (uɤ uəŋ uŋ)	uər (uən uei)
	yar (yan)	yɤr (ye yŋ)	yər (y yn)
aur (au) aur组	ur (u) ur组	əur (əu) əur组	
iaur (iau)		iəur (iəu)	

表 2 乐亭方言儿化韵系统

通过与北京话的对比，我们看到乐亭方言的儿化韵有如下特点：

(1) 与北京话相比，乐亭方言的儿化韵数量大大减少了，儿化韵格局也比北京话整齐许多。

(2) 乐亭方言单字韵的-i、-n尾脱落后ai/an、ei/en的儿化合流；舌尖元音i、前高元音i、y儿化后韵腹趋央、趋中，与中元音的-i、-n尾韵合流，这是与北京话相同的。

(3) 但北京话中，开尾的a组韵母和-n尾、-i尾的ai、an组韵母的儿化韵已经合流，并为一组，但在乐亭话中，a组和ai、an组儿化韵是截然分开的。

(4) 北京话中o、uo两韵母在乐亭方言中读为ɤ、uɤ，相应的儿化韵也为ɤr、uɤr。

(5) 乐亭方言单字音系统中，由于ɤ、uɤ和ie、ye形成互补分布，ɤ和e又同属音位/e/，所以它们实际上属于同一个开齐合撮俱全的聚合：/e/、/ie/、/ue/、/ye/。相应的，它们儿化后的ɤr、iɤr、uɤr、yɤr也属于同一组儿化韵（ɤr组）。也就是说ɤ、ie、uɤ、ye四个韵母在单字韵中虽然按互补分布原则归为了一组，但是开合口和齐撮呼韵母的主元音并不相同，而儿化之后，它们的主元音却变得完全相同，于是它们在儿化韵中才真正在音值上同属一组了。

(6) 乐亭方言儿化韵与北京话最大的不同就是带舌根鼻音韵尾-ŋ的韵母儿化后主元音不带鼻化色彩。唐山地区只有丰南、滦县等地的少数人口中，-ŋ尾韵的儿化形式有鼻化色彩，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儿化韵也都不发生鼻化。于是，结合前面几个特点，就形成下面几组儿化韵的分合：

1984, p273)。北京话中，儿化音产生后，这种平衡就被打破了，如出现了“根儿”（/en/ + /r/ → [ər]）和“歌儿”（/e/ + /r/ → [ɤr]）的对立，等等。儿化产生以后，北京音中上述矛盾得以表现出来，不同儿话韵中本属同一音位的元音音色的差异得以彰显，同时还产生了鼻化元音，它们共同来完成在儿化韵中区别意义的作用。其表现形式是：

/ər/	/əi/	/ən/		/ar/	/ai/	/an/
根儿，黑儿	黑	恩		庵儿，开儿	挨	庵
/ə+r/[ɤr]	/əu/	/əŋ/	/əŋr/[ɤŋr]	/au/	/aŋ/	/aŋr/[ɤŋr]
歌儿	讴	哼	梗儿	熬	缸	膛儿

但是这种矛盾在北京话里并没有发展到底。而在余敏所称的“大河北音系”中，儿化韵则有另一种发展方式，俞敏（1984）以武清音（天津郊县方言，其儿化韵情况与乐亭一致）举例加以说明：

/er/	/ei/	/en/		/ar/	/ai/	/an/
根儿，黑儿	黑	恩		庵儿，开儿	开	庵
/ər/	/əu/	/əŋ/		/ar/	/au/	/aŋ/
歌儿，梗儿	讴	哼		把儿，膛儿	熬	缸

俞敏（1984, p.274）指出，“这里中、低元音各分前后，一共两对：这才把那隐藏的矛盾充分发展到底了。它取消了鼻化元音，打裂了两个元音音位，让音系重新得到了平衡”。武清方言儿化音的表现和乐亭话相同。它们代表着京东方言的儿化韵模式。这一带方言中、低元音儿化韵各分两组的音系学意义也正在于此。因此，前面的儿化韵系统中ɤr组（歌儿，梗儿）、ər组（根儿，黑儿）的主元音非别为ɤ和ə，但从音系角度来看，它们的实际地位分别相当于/e/和/ə/，代表了前后元音的对立。所以，由于京东地区的儿化韵“打散了两个元音音位”，在下面的讨论中，我们不妨打破常规的思路，对该地区的元音系统进行新一轮的“音位划分”，以利于我们的讨论。所以，我们下面不如延用俞敏（1984）的标音方式，用

/er/代表3.1节中所说的ər组儿化韵（根儿，黑儿）；用/ər/代表3.1节中所说的ɤr组儿化韵（歌儿，梗儿），于是将该地区方言的七组儿化韵重新分别记作：

- | | |
|------------|------------|
| ɔr组（把儿，棒儿） | ər组（歌儿，梗儿） |
| ar组（庵儿，孩儿） | er组（根儿，黑儿） |
| ur组（屋儿） | |
| aur组（包儿） | əur组（狗儿） |

3.3 京东方言儿化韵与单韵母的聚合关系

陈保亚（1990）指出，儿化韵和阳声韵在语流音变和物理表现上有共同点，所以可以从整体上考察辅音韵尾矩阵的结构性质。北京话辅音韵尾韵母矩阵很不协合，-r尾的只有ər、ar有与之聚合的ən、əŋ、an、aŋ，or只有oŋ与之相聚和，其他儿化韵（ur、er、ɤr、au、our、ãr、ẽr、õr）没有与之聚合的单位，造成了语音层面不的现象。如下（陈保亚1990，p.452）：

an	ən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aŋ	əŋ	oŋ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ar	ər	or	ur	er	ɤr	our	aur	ãr	ẽr	õr

表 3 北京话辅音韵尾韵母聚合矩阵

但是京东方言的儿话韵由于取消了鼻化元音，同时由于音系中没有o韵母以及or、er卷舌韵母，所以其辅音韵尾矩阵的比北京话整齐许多，系统的协合度也要高许多：

an	ən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aŋ	əŋ	uŋ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input type="checkbox"/>
ar	ər	ur	ɔr	ɤr	aur	əur

表 4 京东方言辅音韵尾韵母聚合矩阵

本文认为，其实-r韵尾并不完全是辅音性质，卷舌色彩是贯穿在元音上的，其元音色彩也是很强的。所以我们考察-r韵尾与音系中其他韵尾韵母的聚合关系时，不妨将元音尾的-i、-u尾也考虑在内。北京话中将它们考虑进来之后，结构依然很不协合。如下：

ai	ai([ei])	□	□	□	□	□	□	□	□	□
au	□	ou	□	□	□	□	□	□	□	□
an	ən	oŋ	□	□	□	□	□	□	□	□
aŋ	aŋ	or	ur	er	ɤr	our	aur	ār	ār	ōr

表 5 北京话有尾韵聚合矩阵

由于前面论述过的京东方言儿化韵所呈现出的特殊的音系意义，让元音尾韵参与进韵母聚合矩阵似乎更符合这些方言的特点。如此一来，在京东方言中，其有尾韵的聚合矩阵就与北京话大不相同了。结合我们前面的讨论，由于京东方言儿化韵产生后，“打裂了两个元音音位”，所以某种意义上，其韵母系统经过了新一轮的“音位化”过程，于是我们可以将韵母区分为元音尾韵 (-V)、鼻音尾韵 (-N) 和-r音尾韵 (-R)，将其聚合矩阵表示如下：

元音尾韵aV(ai)	aV(au)	eV(ei)	əV(əu)	□	□	□
鼻音尾韵aN(an)	aN(aŋ)	eN(en)	əN(əŋ)	uN(uŋ)	□	□
-r音尾韵aR(ar)	aR(ur)	eR(er)	əR(ər)	uR(ur)	auR(aur)	əuR(əur)

表 6 京东方言有尾韵聚合矩阵

这样，我们就看到，京东方言的儿化韵所“分裂”出的两对中、低元音，其儿化韵分别有与之聚合的元音尾-i、-u韵、鼻音尾-n、-ŋ韵与之形成聚和，ur也有鼻音尾韵uŋ与之形成聚和，只有aur、əur两组儿化韵没有与之聚合的有尾韵。这样，韵尾矩阵的协合度就比北京话大大提高了，矩阵变得整齐了许多。

从上面我们看到，无论是考察辅音韵尾韵矩阵，还是有尾韵矩阵，由于京东方言的音系特点和儿化韵的特殊语音表现，其协合度都要比北京话高。

4. 京东方言-r音的跨层面协合运动与其特殊儿化用法之间的关系

4.1 儿化音中-r语素功能的淡化

通过对京东地区各方言面貌的考察，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即，儿化有上述特殊语法功能的京东地区各个方言点，其儿化韵系统几乎都是上文3.1节所展现的面貌。有儿化特殊用法的区域和儿化韵呈上述语音表现的区域所覆盖的范围甚至呈现一种重合的倾向（如图1）。所以，不能不说这两者之间是存在着某种联系的。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到，京东方言儿化韵的-r尾处在协合度很高的聚合矩阵中，只有两组儿化韵（*aur*、*əur*）没有与之聚合的单位，但相比之下，这个比例是相当小的，这两组儿化韵只由四个单字韵母（*au*、*iau*、*əu*、*iəu*）变来，而其他32个韵母变来的儿化韵都处在比较整齐的聚合群当中。那么如此一来，这些京东方言中，实际上-r与元音尾、鼻音尾的聚合关系是非常深的。那么，一方面在语音上，-r的音位功能就会很可能由于元音尾-i、-u，鼻音尾-n、-ŋ的影响而加强。而另一方面，由于音义关系层面的协合运动，-r的语素功能则会发生淡化（当然，这里说的语素功能淡化指的是“-儿”词缀的语素功能淡化，而不是由“里”以及相当于时体助词、方位介词的虚成分汇入儿化音的-r的语素功能）。陈保亚（1990）一文中指出，“儿”体词性功能淡化的标志是非体词性儿化的出现和体词性儿化功能的凝固化。那么，本文接下来就在京东方言中对这一现象进行考察，我们以乐亭所在的滦昌小片方言为例对此做以说明。

首先，乐亭话中儿化的分布范围比北京话要广，儿化词比北京话要多。有一些儿化词中，“儿”的语素意义还较明显，儿化有表小称或喜爱的意义，与北京话类似；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名词，它们在乐亭话中是要说成儿化形式的，但是这种儿化没有为该名词增加任何理性意义，也没有添加语体色彩或感情色彩，只是这些词必须要以儿化的形式出现，本地人在说这些词时从不会不儿化，如：电话儿、饮料儿、煤气灶儿、广告牌儿、眼泪儿、洗手间儿、脚手架儿、地球儿、自行车儿、傍黑儿、前半夜儿、后晌儿等等。这也应该是一种体词性儿化功能凝固化的表现方式。正是因为-r的音位作用增强，“儿”语素作用淡化，才会产生这些

“零意义”的儿化现象。在这些词里，-r只是个纯语音的东西，它合进前面的音节之后没有为其增添任何意义出来，正符合“一音节一义”的普遍规律。

其次，单看“儿”变来的儿化，乐亭、昌黎、滦南等地也存在一些非体词性儿化词，除了北京话中也有的“玩儿”、“蔫儿”、“刺儿”等，还有（参考各地方言志或县志中的方言部分）：

动词：带答不理儿（没礼貌，不爱搭理人）、念央儿（1.哀求，2.抱怨）、气不忿儿（心中感到不平）、巴不得儿

形容词：没溜儿（说话不着边际，或不正经）、齁儿（非常，形容味觉感受，如齁儿甜）、吱儿喳儿火燎（做事毛躁，不稳重）

副词：一划儿（全部、通体）、坐地儿（一开始）、倘忽儿（一开始）、到底儿、正好儿、碰采儿（碰巧）、紧溜儿（赶快）、顺便儿、竟己儿（故意）、一口*儿（i tuɿ² 经常，有时）

拟声词：忒儿喽（吃面的声音）、¹kəɿ（宰猪时猪叫的声音）、呱儿（青蛙叫的声音）、¹ŋɑɿ（婴儿啼哭的声音）、嗽儿（¹ɲɑɿ小狗叫的声音）、喻儿（蚊子叫的声音）、毗儿（放气、划火柴的声音）

此外，乐亭等地在一些结构中，形容词也需要儿化，如：

1. AA儿的（其中“A儿”发生变调，表示程度高或比较高）：高高儿的、好好儿的、大大儿的、香香儿的、干净净儿的、听听说说儿的（很听话、比较听话）

如：这个孩子听听说说儿的

这晚饭香香儿的，你咋不吃啊？

2. AA儿的（其中“A儿”不发生变调，表状态，用在祈使句中）

如：给这个箱子高高儿地放着！（把这个箱子放得高高的）

这个字儿得大大儿地写！（这个字得写的很大）

3. 少数几个形容词，如“远、深、长、短、高”等，有儿化形式，可以受多、

这么、不等副词修饰，如“多远儿、不长儿、这么大儿”等。

由此可以看出，乐亭等京东地区方言中，确实存在体词性儿化功能受限和非体词性儿化出现的情况，这说明在这些京东方言中，儿化韵尾-r的语素功能确实发生了淡化。

4.2 音系结构，-r语素功能的淡化，以及异源成分向儿化音汇入之间的关系

这样的话，由于“-儿”词缀的-r音体词性语素功能发生了淡化，就可能间接地为汇入-r的其他语素功能的进入提供了便利。就好像是“儿”词缀-r腾出了一部分原有语素功能的位置，那么就有可能吸引其他来源的新的语素功能来填补这个位置。这就不经意间为其他语法成分合进儿化音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从而造成“里”、时体、方位虚成分等合进儿化音，为-r增加了新一轮次的语素义。

正是由于这些京东方言中，-r尾与其他韵尾韵母的聚合程度非常高，音系结构的协合度比较高，才有利于那些异源成分汇入-r音。这是因为，这些异源成分，尤其是分布在动词后的时体、方位虚成分，都有着明显的语法意义，只要符合特定的结构，不管前面的动词是什么韵母的音节，都可以进入“V-r”的结构，即客观上所有韵母的字都可能形成非体词性儿化词。这就要求-r音与其他韵尾韵母的聚合矩阵足够协合，进入聚合关系的韵母数量达到的比例足够大。京东方言的音系结构正满足这个要求。而相比之下，北京话的条件则差得多。因为北京话中只有ar、ər与其他韵尾的韵母处在比较齐整的聚合群中，而剩下约有一半单字韵母生成的儿化韵都处在不协合状态下。于是，-r体词性功能的淡化就基本只出现在ar、ər组儿化韵中。而其他大量儿化韵则不具备这个条件，它们的-r语素功能淡化的程度就小得多，于是便腾不出位置让给那些异源成分所带来的新的语素义。所以在北京话中，这种-r在语音层面协合运动的不平衡性，与汇入-r的异源成分语法功能所要求的语音上的周遍性就产生了矛盾，因此，这种矛盾就阻碍了这些异源成分向-r音的汇入，使得京东方言儿化的特殊语法功能在北京话中并未出现。

本文所考察的京东地区的周边地带，如迁安、迁西等地方言的儿化情况，也

可以作为我们的佐证。唐山市的迁安、迁西两地，也位于北京东部，与本文所讨论的地区相接，和唐山市区、滦县等地接壤，其方言属冀鲁官话保唐片冀遵小片。它们与我们所论及的地区地理位置如此之近，但在这两地方言却并不存在我们所说的“儿化的特殊语法作用”。而这两地的儿化音系统，也与唐山其他地区的表现很不相同。根据张秋荣（2005）、江海燕（2000）、刘丽辉（2003）等人的文章，这一地区，“儿”字读音为[əu]（迁西有些人已经读ər了）。这两地的儿化韵很不发达，不同韵母的儿化合音进程不同步。儿化的读音情况分为已形成儿化韵和“儿尾”自成音节两种形式。儿尾自成音节指的是词缀“儿”还没有融合进前一音节，“X儿”中，“儿”是个独立音节。儿尾自成音节的情况主要集中在韵尾为-u、-ŋ的韵母以及i、y、i韵母的儿化中。其他韵母的儿化则形成八个儿化韵（əu、əu等），“儿”合入前一音节。张秋容（2005）中明确指出：

唐山的大部分地区，如唐山市区、丰润、遵化、丰南、乐亭、滦县，单音节动词可儿化，动词儿化替代动态助词，体现动态变化。如：

a、骑儿马来的。（相当于普通话“骑着马来的，”）

b、这字儿真难看，快擦儿它。（相当于普通话“这字儿真难看，快擦了它”）

迁安方言中，单音节动词很少有儿化的，即使儿化了也没有这一语法功能。

（张秋荣，2005，p19）。保定话儿化的语音表现和迁西、迁安相似，也有一部分韵母的儿化形式是儿尾自成音节的。不过其“儿”是卷舌音ər，不是平舌的əu，相应地其儿化韵也为卷舌形式。而保定话中，也没有出现我们文中所讨论的儿化表时体、方位功能的特殊用法。

这其中的原因和前面讨论的北京话中没有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一样的。这就是由于儿化音在语音层面协合运动的不平衡性与汇入儿化的异源成分语法意义所要求的语音上的周遍性的矛盾造成的。因为那些异源成分汇入儿化音的年代“不会早于儿化音产生之前”（李思敬，1994，p98）。它们汇入的是儿化音位（-r

或-*ui*，如果都可能的话），而不是汇入“儿”这个语素或“儿”这个字。正因为如此，它实际上是跟着儿化音位走的，而不是跟着“儿”这个字走。所以它就需要在语音上有一个相同的表现形式，而不是像迁安、保定等地的“儿”尾一样出现在不同韵母的音节时语音表现不一，有的要与前一音节合在一起，有的则要独立成两个音节。

通过前面的论证和其他方言情况的对比，我们看到，京东地区方言中，异源成分汇入儿化音，导致儿化出现特殊语法功能（非体词性的时体助词、方位介词、体词性的方位名词“里”等功能）的现象，的确是这些地区方言的音系结构相关的，语音层面和音义关系层面协合运动是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一大诱因。

5. 京东方言中特殊儿化现象发展方向预测

前面我们讨论了京东地区方言中儿化的特殊语法功能的产生与当地方言音系结构之间的关系。虽然这些儿化的特殊功能并不是语音的协合运动直接产生的，但是该地区方言的音系结构确实对此现象的出现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时体虚成分等异源结构汇入儿化音提供了成长的土壤。不管来源如何，这些特殊儿化现象产生之后，在共时面貌上对当地语言的影响之一就是，它客观上造成了-r语素功能的多样化和非体词性儿化用法的大量涌现。那么，这种局面又将会对该地区方言各层面协合运动的发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认为，一方面，由于这些特殊儿化现象的产生，京东地区方言儿化音-r相当于时体助词、方位介词的语素功能非常明显，这就会导致“儿”尾原有的体词性语素功能的进一步减弱，进而由于其音义关系层面的协合运动，造成-r音的音位功能进一步加强，形成儿化韵与其他有尾韵聚合程度的进一步加深；而另一个方面，又由于那些异源成分变成的儿化音-r的语素功能非常强，于是又会起到削弱-r音位功能的作用，阻碍儿化韵与其他韵母的聚合在语音层面的协合运动。这两个方面看似是矛盾的，但实际上它们是-r两个不同轮次的语素功能（“儿”的语

素功能，以及“里”、时体方位虚成分的语素功能）对语言结构分别作用并相互竞争的结果。由此可见，在-r的两个轮次的语素功能影响下，产生了两个相反的作用力，于是对语言结构产生了一种制约平衡，使其达到了相对稳定。其实京东方言的儿化韵本可以继续由于语音层面的运动，也像北京话一样继续合并，连中低元音的前后对立也取消掉，**or**组并入**ar**组，**vr**组并入**ar**组，使儿化韵母越来越向单字韵母的聚合模式靠拢，但是在这些方言中，儿化韵系统还相当稳定，并没有出现儿化韵进一步归并的现象，这大概与上述制衡作用是不无关联的。

京东地区方言儿化情况今后究竟如何的发展，则大概要看上述-r尾两个轮次的作用力孰强孰弱了。不过，笔者观察到的一种迹象倒是可能暗示出了该地区方言有特殊语法功能的儿化现象今后的发展趋势。在乐亭方言中，前文所介绍的京东方言特殊儿化用法出现的结构中，如今在少数人有时的话语中，出现了儿化和时体、方位成分重置的现象，如：

屋儿有人、吃到肚子儿去咧——有人说成“屋儿里有人”，“吃到肚子儿里去咧”

快擦儿它——有人说成“快擦儿喽³⁾它”

我跑儿来的——有人说成“我跑儿着来的”

这可要儿我命咧——“这可要儿咧我命咧”

知道错儿哪儿咧——有人说成“知道错儿的/到哪儿咧”

这种重置现象可能就跟音义关系的协合运动有关。由于这些有特殊语法意义的儿化破坏了汉语“一音节一义”模式的要求而造成音义关系层面不协合，于是导致结构发生重新分析，-r的表时体、方位的语素功能也降低甚至消失，以致在有些人的观念里，已经意识不到这些结构中的儿化音其实表达的是时体或方位概念，而认为它只是一个纯语音的东西，所以还要在这些结构中的儿化之后再加上“里”“到”“咧/喽”“着”等成分。如果这一趋势的影响扩大，进而大范围发展开去，

3) “喽”相当与普通话的语气词“了”。

最终将会在该方言中形成大量新的儿化词，其中占很大比例的是非体词性儿化词，这些儿化词中，-r音是纯语音层面的东西，没有语素意义，最终这些非体词性的儿化词也将在语法分布上扩展开去，不再限制在特定的结构中。于是，就会在客观上形成“真正的”（即不附带时体、方位意义，不受语法条件约束的）非体词性儿化词的大量涌现，-r两个轮次的语素意义都大大弱化，那么进而则更会导致其音位功能的大大增强，引发语音层面上新一轮的协合运动。

不过，目前上述儿化和时体、方位成分重置的现象只发生在少数人有时的话语中，还很不成气候，有特殊语法功能的儿化用法在京东方言里还是比较稳定的，上述变化在短时期内还不会出现，但假以时日，这种变化的倾向应该会最终显现出来。

6. 结语

本文结合陈保亚（1990、2015）所提出的语言结构的“协合”理论，对京东方言的特殊儿化现象从分布、用法、来源、语音表现、音系归属等层面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这一区域的方言中，“儿”词缀的来源复杂，表现形式丰富，并涉及语言不同层面的相互作用。本研究揭示出这些儿化特殊用法的产生和当地方言音系结构之间的关系，并论证了语言在音系、语素等不同层次的运动与此特殊现象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而为语言跨层次协合运动理论补充了新的材料和观察角度。其中，京东方言儿化涉及了两个轮次的语素功能的演变，这是该地区方言儿化现象最为特别的地方，它们所体现出的语言结构与变异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独具特色的表现方式。通过这样的研究方法，我们也能够对京东方言特殊儿化现象在日后的发展做出合理的预测。笔者也希望本文能够对其他方言中相关或类似现象的研究提供新的材料和思路。

〈参考文献〉

- 陈保亚 (1990) 语言演变的结构基础, 载《缀玉集》第一集, 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15) 《20世纪中国语言学方法论研究》, 商务印书馆。
- 李巧兰 (2007) 《河北方言中的“-儿”形式研究》, 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 李思敬 (1981) 汉语音韵学文献上的儿化音记录考, 《语文研究》, 1981年第1期。
- (1994) 《汉语“儿”[ə]音史研究》, 商务印书馆。
- 刘丽辉 (2003) 《唐山方言词尾“儿”的读音研究》, 河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张文光 (2001) 唐山方言单音节动词儿话与动态变化, 《唐山师专学报》, 2000年1月。
- 江海燕 (2000) 河北迁西方言的儿化, 《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0年3月。
- 王福堂 (2002) 北京话儿化韵的产生过程, 《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六辑, 商务印书馆。
- 王洪君 (2008) 汉语非线性音系学, 北京大学出版社。
- 俞敏 (1984) 北京音系的成长和它受的周围影响, 《方言》, 1984年第4期。
- 张秋荣 (2005) 《迁安方言儿化现象研究》, 河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 张文光、丁新龙 (2003) 唐山方言“A去咧”格式初探,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3年1月。
- 赵元任 (1979) 《汉语口语语法》, 商务印书馆。
- 《宝坻县志》, 宝坻县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5。
- 《昌黎方言志》, 河北省昌黎县志编纂委员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 合编,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4。
- 《丰润县志》, 丰润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3。
- 《河北省志·方言志》, 河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编, 方志出版社, 2005。
- 《乐亭县志》 第七编社会 第四章方言, 乐亭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 《宁河县志》, 宁河县地方志编修委员会编著,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91。
- 《平谷县志》, 平谷县志编纂委员会, 北京出版社, 2001。
- 《玉田县志》, 玉田县志编纂委员会 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3。
- 《遵化县志》, 遵化县志编纂委员会 编, 河北人民出版社, 1990。
- Martinet, Andre (1978), Function, Structure and Sound Change, in *Readings in Historical Phonology, Chapters in the Theory of Sound Change*, edited by Philip Baldi Ronald N. Werth.

〈中文摘要〉

本文通过对京东方言的特殊儿化现象的考察,结合陈保亚(1990、2015)的“协合”理论,揭示出这些儿化特殊用法的产生和当地方言音系结构之间的关系,并论证了语言在音系、语素等不同层次的运动与此特殊现象之间的密切联系,从而为语言跨层次协合运动理论补充了新的材料和观察角度。其中,京东方言儿化涉及了两个轮次的语素功能的演变,这是该地区方言儿化现象最为特别的地方,它们所体现出的语言结构与变异之间的关系,也呈现出独具特色的表现方式。

关键词:京东方言,儿化,协合,跨层次,语言演变

〈Abstract〉

Cross-level Coordination Movement in Languages:

A Case Study of Retroflex Suffixation in the Dialects to the East of Beijing

Ai, Yifang

This paper studies the special performances of the retroflex suffixation in the dialects to the east of Beijing. According to the coordination theory proposed by Chen Baoya (1990 & 2015),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re is a strong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pecial retroflex suffixation and the phonological structure of the dialects of that area. Then it is proved that languages are under coordination movements through different levels, like the phonological and the morphemic levels. So this study complemented new materials and viewpoints to the cross-level coordination theory. And in the dialects of this area, two waves of morpheme function changes are involved in their retroflex suffixation, which makes the most special points of the phenomenon under discussion. It showed great correlations between language structure and language change.

288 中國文化研究 第46輯

Key words: Dialects to the east of Beijing, Retroflex suffixation, Coordination,
Cross-level, Language Change

이 논문은 2019년 10월 16일에 접수되어 2019년 11월 10일에 심사가 완료되고
2019년 11월 11일에 게재가 확정되었음.